

分报告 4:

经济下滑背景下的失业分析及预测：2008-2009

丁守海

内容摘要：本文首先设计了一种估算就业弹性的研究方法，并基于面板数据，估计了我国东中西三地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就业弹性。根据这些弹性数据，结合未来经济形势的研判，估算了 2008-2009 年我国的新增就业规模，我们发现，第二第三产业所能提供的新增就业岗位将比上年减少 600 万，这种减少主要来自东部地区以及制造业和建筑业。进一步，我们估算了非农劳动人口的增长趋势。二者结合，来年失业规模将比上年增加 1000 万，城镇失业率将达到 8% 左右。进一步，本文归纳了失业的具体原因和渠道，并对其特征进行了描述。最后从财政政策导向、积极就业政策、消极就业政策、劳动管制政策等维度提出了政策建议。

一、引言

就业是民生之本。充分就业意味着劳动资源的充分利用，能为社会分配结构的改善奠定基础；而大规模失业往往会引发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比如群体贫困、内需消退等。促进充分就业、应对失业危机，是各国政策调控的重要目标。

我国自 2003 年以来，在强劲的经济增长驱动下，就业规模不断扩大，就业质量也得到了较大提高。2003-2007 年每年城镇就业的净增加数量都超过了 800 万，2007 年更是超过了 1000 万，其中最正规的城镇单位就业就增加 300 万，占城镇就业增加的 1/3 左右。然而，新增就业规模的持续扩大，并没有从根本上缓解我国的就业压力，失业问题依然严峻。对于这一点，我们可参见表 1：

表 1 我国城镇失业规模及失业率演变（1990-2007）

年份	城镇失业规模	城镇失业率
1990	574	0.033
1991	600	0.033
1992	630	0.034
1993	660	0.035
1994	680	0.035
1995	790	0.040
1996	815	0.039
1997	980	0.045
1998	1450	0.063
1999	1397	0.059
2000	1907	0.076
2001	1407	0.056
2002	1620	0.061
2003	1643	0.060
2004	1623	0.058
2005	2052	0.070
2006	1844	0.061
2007	2250	0.071

注：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和《2007 年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估算。具体地，用经济活动人口减去就业人数，得出失业人数。由于我国不考虑农村失业问题，这个数字可近似视作城市就业市场上的失业人数，用它除以城市就业市场劳动总数，得出失业率。

由表可见，近年来我国城镇失业规模有增无减，每年达到 2000 万左右，2007 年更是达到 2250 万。从相对比率看，城镇失业率持续攀升，近年来一直维持在 6% 以上的高位，远超过官方公布的 4% 左右的登记失业率。2007 年城镇失业率达到了近年来的峰值 7.1%。失业问题的严峻性来自于两个指标的对比，即新增劳动人口与新增就业机会的多寡。作为一个人口大国，我国最根本的问题在于，庞大的人口基数导致每年新增劳动人口过多，而经济增长所引致的就业机会难以满足就业扩大的需求。以 2007 年为例，我国城镇就业新增 1200 万，

但由于劳动人口的自然增长、大学毕业生增加、下岗职工再就业等压力，至少需要 2400 万新增就业岗位，因此与上年相比还是出现了较大规模的新增失业人员。

新增劳动人口一般是按照较平稳的轨迹演进的，也是我们难以控制的，因此要考量失业压力，主要应从新增就业机会的角度来进行。而新增就业机会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即经济增长的速度和经济增长的要素投入方式。经济增长速度取决于国民经济各个行业的产出水平，尤其是工业和服务业的产出水平。而经济增长的要素投入方式则取决于劳动要素的相对价格。一般而言，工资上升会导致企业采纳劳动节约型生产技术，并迫使经济增长的就业拉动能力下降。

我国当前正面临着上述两个方面的挑战：首先，2008 年以来世界经济动荡、金融海啸迭起，已经波及到我国实体经济，许多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纷纷倒闭，据统计，仅 2008 年上半年就有 6.7 万家规模以上中小企业破产，造成了近 2000 万人失业。目前人们普遍认为，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将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放缓，这必然引起就业岗位的大量流失，失业风潮也可能由此而起；其次，自 2004 年以来我国工资成本不断上升，并跻身于世界上工资上升最快的国家之列，劳动的廉价优势正在丧失。除市场力量的作用外，工资上升在相当程度上也是政府劳动管制政策作用的结果。2004 年我国颁布了新的《最低工资规定》，此后各地普遍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导致以农民工为代表的底层劳动力工资迅速上升。2008 年《劳动合同法》的实施使得企业用工成本进一步增加，据称这个幅度不低於 20%。劳动成本的大幅上升，既会加剧工业部门的发展困境，更会导致企业对劳动要素的节约使用。这在以制造业为代表的劳动密集型部门将表现的尤为突出。

那么未来一段时间内，在经济下滑和工资上涨的背景下，我国失业问题究竟会演变到怎样的程度？失业又会呈现出怎样的特征？面对这一形势，我国应采取怎样的对策呢？本文将致力于这些问题的研究。当前我国正处于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关键时期，就业是其中的枢纽环节，牵一发而动全身。适时分析就业形势所可能出现的变化并采取前瞻性的应对措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要准确地预测经济下滑对就业的影响，关键是要得出就业的 GDP 弹性参数。很多学者认为，我国的就业弹性正在趋于下降（齐建国，2000；龚玉泉、袁志刚，2002；程连升，2007），尤其是从上世纪 90 年代开始，形成了一个明显的转折点（张本波，2005）。但目前我国的就业弹性究竟下降到了多少？对于这个问题，学术界并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认识。有人认为不足 10%，甚至是负值，有人则认为并不低，至少不低於 0.2。这种分歧主要源自估算方法的不同。

目前人们对就业弹性的计算方法主要存在两种分歧：首先是口径的差异，

很多学者是基于整个经济的 GDP 来计算就业弹性,结果由于第一产业的劳动排斥,就业的 GDP 弹性会很低,但如果要剔除农业部门,单就第二和第三产业来计算,我们就会发现,就业弹性并不低,并接近于 0.19(蔡昉、都阳、高文书,2004);其次是具体的弹性测算方法的差异:一种是直接用考察期内的就业变化率除以 GDP 变化率,它又包括点弹性(张车伟、蔡昉,2002)和弧弹性方法(齐建国,2000),但就点弹性方法而言,它所得出的各年的结果可能相差极大,根本无法预期出一个稳定的结果,而弧弹性方法则忽略了长时间内经济增长要素投入结构所可能发生的变化;第二种估算就业弹性的方法就是基于时间序列的回归分析(李红松,2003;陈安平,2004;张本波,2004;蒲艳萍,2006;邬雪芬,2007)。该方法的重大缺陷在于,为了保证样本容量和模型自由度,必须选择较长的时间序列,如前所述,在较长的时间范围内,经济的要素投入结构可能会发生变化,就业的 GDP 弹性也可能会有所不同,这样通过简单的回归方法就很难体现出这种差异,尽管在这些模型中,添加了用时间哑元变量所标示的结构性变量,也不足以解决上述问题,因为我们很难断定结构性变化的断点究竟在何处。

本文将设计一种改进的方法来估算我国当前的就业弹性,并基于弹性估算来进一步预测未来的新增就业规模,再结合新增劳动力数量,预测失业规模,并对失业的原因、渠道和特征进行描述。具体地,本文内容安排如下:第二节以面板数据模型为基础,详细说明本文所采纳的研究方法;第三节利用 2003-2006 年我国各省市的年度面板数据,估计出非农产业的就业弹性以及工资变化对这一弹性的影响;第四节基于上述参数以及对未来经济形势的研判,预测新增就业机会,并结合新增劳动力数量的趋势,估计 2008-2009 年新增失业规模;第五节对未来失业的渠道和特征做出分析;第六节基于上述分析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二、研究设计及数据说明

本文将选择面板数据模型来进行研究,该模型具有如下的优点:首先,它是基于截面单元的综列数据的回归分析,可以避免点弹性或弧弹性的不足;其次,它并不需要长的时间序列,因此可以避免时间序列回归所带来的问题;再次,在较短的时间内影响就业的其他因素可以得到有效控制,即便不能完全控制住这些遗漏变量,通过组内除均值的方法或组内部分除均值的方法,也可以绝大部分地消除它们的影响,从而提高参数的估计精度。那么该模型应该引入哪些变量呢?对此我们可以根据柯布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进行一个简单的推

演。

令生产函数为 $Y = f(K, L)$ ，其中 K 和 L 分别为资本和劳动投入。设工资为 w ，利率为 r ，那么在生产者均衡条件下，要素投入的比例关系应满足下式：

$$\frac{MP_L}{MP_K} = \frac{w}{r}, \text{ 即 } MP_K = \frac{r}{w} MP_L, \text{ 因此 } K = \varphi(L, w, r), \text{ 也就是说资本投入量应该是}$$

劳动、工资和利率的函数。把上式代入到生产函数中，有 $Y = f(\varphi(L, w, r), L)$ ，

相应

地，我们有如下的反函数： $L = f^{-1}(Y, w, r)$ ，即劳动需求量是产出、工资和利率的函数。因此从理论上讲，就业模型模型应当引入产出、工资和利率变量。但是考虑到我国执行统一的利率政策的实践，各地的利率基本无差别，地区就业差异应该不是来自于利率变量。因此模型不引入利率变量。

具体地，我们构建如下的面板数据模型：

$$\ln L_{it} = \alpha_0 + \alpha_1 \ln Y_{it} + \alpha_2 \ln w_{it} + \sum_{j=1}^2 \beta_j \times reg_j \times \ln Y_{it} + \sum_{v=1}^3 \gamma_v \times clu_v \times \ln Y_{it} + \delta z_{ij} + u_i + \varepsilon_{it}$$

式中下标 i 表示截面单元，为全国各省市，考虑到西藏和青海的特殊性，将其从截面单元中去除，这样共有 29 个截面单元；下标 t 表示时间序列，考虑到我国从 2003 年之后进入经济快速发展时期，而就业市场也进入了连续的繁荣期，为了尽量减少其他因素的变化所带来的干扰并兼顾数据的可得性，本文的时间取 2003-2006 年的年度数据，当 t 取 1 时表示 2003 年，取 2 时表示 2004 年，依此类推，当 t 取 3 和 4 时，分别表示 2005 年和 2006 年。文中数据主要取自各年《中国统计年鉴》或经过简单的计算得出，模型中的各个变量说明如下：

被解释变量 $\ln L$ 为非农就业数量的对数。由于我国失业主要是针对城市部门而非农村的，因此本文关注的也是城市部门的就业数据，包括第二三产业的就业数量。2003-2005 年各省各次产业就业数据可以方便地从《中国统计年鉴》获取，但 2006 年《中国统计年鉴》没有各省分三次产业的就业数据。我们用各省分行业的城镇单位就业数据与城镇分行业的个体私营就业数据相加，得到城镇各行业的就业总数，再按三次产业分类，即可估算出 2006 年各省三次产业就业数。其中第二产业的就业对数记为 $\ln L_{II}$ ，第三产业的就业对数记为 $\ln L_{III}$ 。

解释变量 $\ln y$ 为 GDP 对数。如果用第二产业的 GDP 和第三产业的 GDP 来分别计算其就业弹性，我们就会发现它们相差很大（蔡昉、都阳、高文书，2004），因此本文将分别用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人均 GDP 指标来考察。其中第二产业

的 GDP 指标的对数记为 $\ln Y_{II}$ ，第三产业的 GDP 对数记为 $\ln Y_{III}$ 。为具有可比性，各名义 GDP 指标均按实际 GDP 指数折算成以 2003 年为基期的水平。

解释变量 $\ln w$ 为工资对数。按生产者均衡原理，企业劳动需求取决于边际工人的工资与其边际产品的交点，因此决定就业或失业规模的往往是低工资的底层劳动者，他们在经济波动的情况下也最容易被解雇，所以选择的工资变量应当是各地工资结构中最底层的部分。在各地的工资结构中，集体企业工资往往最低，甚至与农民工工资相接近（侯风云，2004）。因此我们可用它来作为工资指标。具体地，在第二产业中，由于制造业和建筑业不仅集中了最大规模的就业人员，其工资也处于最低水平，因此我们用这两个行业集体工资的平均数作为第二产业的工资指标，记为 $\ln w_{II}$ ；类似地，在第三产业中，批发零售和住宿餐饮两个行业集中了最大规模的就业人员，其工资也在第三产业中居于最低水平，因此我们用这两个行业集体工资的平均数作为第三产业的工资指标，记为 $\ln w_{III}$ 。同样出于可比性考虑，各工资指标均按通货膨胀指数折算成 2003 年基期水平。

如前所述，在不同的经济结构下，经济增长的要素投入方式可能不同，因此相同的经济增长速度所带来的就业后果可能也是不一样的。一直以来，我国地区之间存在较大的经济发展差异，这种差异不仅表现在经济发展水平和速度上，还表现在经济结构上，尤其是产业结构上。我们依据惯常的分类方法，把所有省份按东中西三地分成三组，并设置哑元变量 reg_j ，对西部地区， $j=0$ ， $reg_0=1$ ，作为基准组；对中部地区， $j=1$ ， $reg_1=1$ ；对东部地区， $j=2$ ， $reg_2=1$ 。再设置交叉变量 $reg_j \times \ln W$ ，其系数 β_j 反应了不同地区间产业发展对就业的影响差异。

我们在前面也指出，在不同的工资水平下，企业所采取的要素投入组合可能也是不同的，尤其地，在工资连续快速增长的情况下，企业可能会采取节约劳动型生产技术，从而使产出增长的就业拉动能力下降。因此工资变量可能会对产出的就业弹性施加一层叠加影响，从这个角度讲，我们应该设置一个工资与产出的交叉变量，但我们也必须注意到，要素投入组合的变化代表技术的变迁，一般不可能随时随地地连续发生，多数情况是，在工资累积上涨到一定程度时，技术变迁和要素组合的变化可能才会发生。因此我们在设置交叉变量前，同样设置一个对工资进行分组的哑元变量 clu_v ，根据工资的分布特征，我们将样本分成四组：第一组是基准组，集体单位年工资低于 6000 元的， $v=0$ ， $clu_0=1$ ；第二组介于 6000 与 9000 元之间的， $v=1$ ， $clu_1=1$ ；第三组介于 9000 与 12000 元之间的， $v=2$ ， $clu_2=1$ ；第四组在 12000 以上的， $v=3$ ， $clu_3=1$ 。然后再设置交叉变量 $clu_v \times \ln Y$ ，其系数 γ_j 反应了随着工资上升到不同组别后，产业发展所带

来的就业后果的差异。

z 为控制变量，我们试图控制住劳动供给因素对就业的可能影响。非农部门的劳动供给来自于两个渠道，即城镇劳动力和农村转移劳动力，因此控制指标也包括两个：就城镇劳动力来说，由于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会直接影响到其劳动参与行为，因此我引入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对数 low ，该数据可以在各省劳动与社会保障部门的网站上查到，并取各地的平均数；就农村转移劳动力而言，务农收入是其从事务工工作的机会成本，会直接影响到务工的比较收益，并对其劳动供给产生重要影响。因此我们引入农民务农收入的対数 $fram$ 。用农民人均年收入乘以农村居民总数，再除以从事农林牧渔业的人数，即可得到务农收入数据。为具有可比性，我们按通货膨胀指数将上述两项指标分别折实为2003年水平。

u 为截面效应， ε 为满足白噪声条件的随机扰动项。面板数据模型的参数估计方法关键取决于截面效应 u_i 的性质，具体估算步骤可参见丁守海（2006）。

三、实证检验结果及就业弹性估计

本节将分别采用混合OLS回归方法、固定效应模型、随机效应模型方法对模型参数进行估计。并利用 $F(_ui)$ 指标、Breusch—Pagan的LM值和Hausman指标值对最终方法进行选择。为了保证结果的稳健性，我们在模型中逐步引入回归因子和控制变量。第二、三产业的参数估计结果分别见表2和表3：

表2 第二产业就业模型的估计结果（被解释变量 $\ln LII$ ）

	OLS	FE	RE	RE
栏	(1)	(2)	(3)	(4)
$\ln Y_{it}$	0.231**	0.151**	0.136*	0.129*
$\ln w_{it}$			-0.139	-0.104
$reg1 \times \ln Y_{it}$	0.031	0.012	0.009**	0.007*
$reg2 \times \ln Y_{it}$	0.172**	0.081*	0.073**	0.062**
$clu1 \times \ln Y_{it}$			0.200	0.153
$clu2 \times \ln Y_{it}$			-0.082	-0.038
$clu3 \times \ln Y_{it}$			-0.025***	-0.018**
控制变量	无	无	无	有
$F(_ui)$		341.7	509.6	279.8
LM		820.4	1103.1	690.3
Hausman		88.6	0.22	-1.38
A-R ²	0.179	0.226	0.241	0.255

注：(1) ***、**、*分别表示通过1%、5%、10%显著性检验。下同。

(2) FE为固定效应模型；RE为随机效应模型。控制变量包括low和farm。下同。

表的第(1)栏结果显示，在混合OLS回归方法下，第二产业产值系数为0.231，中部地区的哑元变量不显著，而东部地区显著为0.172。但是从第(2)栏可以看

出， $F(_ui)$ 为341.7，固定截面效应能通过1%的显著性检验，LM为820.4，随机截面效应也能通过1%的显著性检验，因此第（1）栏的OLS分析结果是不可信的。进一步，Hausman指标为88.6，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RE方法和FE方法结果相同的假说，因此出于参数估计一致性的考虑，应选择FE模型。从第（2）栏可以看出，这时产值系数变为0.151，两个区域变量分别变为0.012和0.081。第（3）栏引入了工资变量以及工资分组与产值的交叉项，参数发生相应了变化，为了检验第（3）栏参数估计结果的稳健性，我们在第（4）栏引入了两个反应劳动供给因素的控制变量low和farm，结果发现各项参数虽然发生了一定的变动，但幅度并不大，而且参数的性质没有改变，参数的稳健性较好。

第（4）栏显示，第二产业产值每提高1%，基准组（西部地区工资最低的组）的第二产业的就业人数将增加12.9%，从交叉变量 $reg \times \ln Y_{II}$ 可以看出，在中部地区工资最低的组，就业人数将增加 $12.9\% + 0.7\% = 13.6\%$ ，在东部地区工资最低的组，人数将增加 $12.9\% + 6.2\% = 19.1\%$ 。再从另一组交叉变量 $clu \times \ln Y_{II}$ 可以看出，在工资较高的第二组和第三组，交叉项的系数都不显著，因此这两组的就业弹性与工资最低的基准组没有系统性差异，但是在工资最高的第四组，交叉项系数显著为-0.018，这表明在这一组，其就业弹性比工资较低的前三组要显著地低出1.8%。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可能的原因是在前三组，虽然工资在不断地提高，但由于提高的幅度有限，尚不足以引导企业采取节约劳动型的新技术，只有当工资明显地提升到第四组的水平时，企业才具备采纳这种技术的动力和压力。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工资变量 $\ln w_{III}$ 的系数不显著，这与劳动需求与工资呈反向变动的理论预测不相吻合，我们认为这可能与已经按工资对样本进行分组的做法有关，它在相当程度上吸纳了工资的就业影响，并导致剩余的影响不显著。

表3 第三产业就业模型的估计结果（被解释变量 $\ln L_{III}$ ）

	OLS	RE	RE	RE
栏	(1)	(2)	(3)	(4)
$\ln Y_{III}$	0.410*	0.269**	0.247*	0.226*
$\ln w_{III}$			-0.144	-0.173
$reg1 \times \ln Y_{III}$	-0.125	-0.015**	-0.011*	-0.009*
$reg2 \times \ln Y_{III}$	-0.133	-0.093	-0.077	-0.052
$clu1 \times \ln Y_{III}$			0.109	0.133
$clu2 \times \ln Y_{III}$			-0.035***	-0.024**
$clu3 \times \ln Y_{III}$			-0.102*	-0.076*
控制变量	无	无	无	有
$F(_ui)$	205.2	498.4	410.7	319.4
LM	919.3	1080.3	769.3	243.1
Hausman		-0.17	1.33	-2.9
A-R ²	0.165	0.187	0.209	0.230

表3第（2）栏的 $F(_ui)$ 值和LM指标分别为498.4和1080.3，他们均能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固定截面效应和随机截面效应不显著的假说，因此第（1）栏

的OLS方法是不合适，进一步，Hausman指标为-0.17，表明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的参数估计结果很接近，出于估计有效性的考虑，应选择随机效应模型RE。该栏显示，在基准组西部地区，第三产业的就业弹性为0.269，而中部地区，就业弹性比西部地区显著地低出1.5%，在东部地区，就业弹性则与西部地区没有系统性差异。在第（3）栏，我们开始引入工资变量lnwIII及其与工资分组变量的交叉项，结果发现，原来第（2）栏的参数估计结果均发生了小幅的变化，而新引入变量的参数显示，在工资较高的第二组，就业弹性与工资最低的第一组并没有显著的差异，但在工资更高的第三组和第四组，就业弹性分别比基准组显著地低出3.5%和10.2%。为了检验第（3）栏结果的稳健性，我们在第（4）栏引入控制变量low和farm，结果表明，参数估计与第（3）栏的变化不大。

根据第（4）栏，第三产业产值每提高1%，基准组（西部地区工资最低的组）的第三产业就业人员将增加22.6%，交叉项reg×lnYIII的系数显示，在中部地区工资最低的组，就业弹性将略微低出0.9%，降为22.6%-0.9%=21.7%；在东部地区工资最低的组，就业弹性与基准组则没有显著的差异。另一组交叉项clux×lnYIII的系数则显示，在工资较高的第二组，就业弹性与工资最低的组之间并不存在明显的差异；但在工资更高的第三组，就业弹性要比最低组显著地低出2.4%，而在工资最高的第四组，就业弹性比最低组显著地低出了7.6%。同样在这个模型中，工资变量的系数并不显著。对于它的解释同前，唯一有区别的是，在这里，随着工资上升到第三组，就业弹性就开始显著下降，这说明相对于第二产业，在第三产业中要素投入结构的变化似乎要更容易发生一些，究其原因，这可能与我国目前第三产业的技术水平比较落后、技术结构比较简单有关。

四、失业规模的估算

基于上述就业弹性的估计，我们可以分地区测算未来一段时间内，在当前的产业发展态势下，我国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所能创造的新增就业机会，在此基础上结合非农产业新增劳动力的供给预测，就能大致估计出新增失业的大致规模。作为最初步的一项工作，我们先要依据东中西三地当前的工资水平，并对照表2和表3，确定这三个地区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就业弹性，结果见表4：

表4 东中西三地非农产业的就业弹性及新增就业预测

		工资分组				预计 增速	新增 就业：万
		第一组	第二组	第三组	第四组		
东部	第二产业				0.173	0.138	265
	第三产业				0.150	0.143	229
中部	第二产业			0.136		0.183	150

	第三产业		0.217			0.133	223
西部	第二产业				0.111	0.218	85
	第三产业			0.202		0.128	167
合计							1120

对于东部地区第二产业来讲，目前平均的折实工资约为14080元，处于最高的第四组，根据表2，其就业弹性为 $0.129+0.062-0.018=0.173$ ；对于东部地区的第三产业来说，目前折实工资约为13051元，也处于第四组，对应于表3，就业弹性为 $0.226-0.076=0.150$ 。可见，东部第二产业的就业弹性还要略高于第三产业，这充分说明了，东部经济是以劳动密集型工业为重要支撑的，特别是加工制造业构成了其产业结构的主导。对应于较发达的工业经济，东部的第三产业也呈现出高级化的发展态势，而不是单纯依赖于传统服务业这样的劳动密集型行业，比如以金融、中介、咨询为代表的服务业发展迅猛，相应地，第三产业的主导要素特征表现为知识的密集投入，而不是底层劳动要素的密集投入。根据类似的方法，我们可以估算出中部地区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就业弹性分别为0.136和0.217，而西部地区两个产业的就业弹性分别为0.111和0.202。可见，在中西部地区，第二产业的就业弹性不仅明显地低于第三产业，它们还要明显地低于东部地区，这可能与中西部地区国有经济比重较高，企业用人机制不够灵活有关。

为了估测来年的就业规模，我们还需要预计各地区各产业的增长速度。对此我们应结合两个方面的因素来考虑：首先是宏观经济大背景，目前人们普遍认为我国经济开始进入了深度下滑的通道，2008年第三季度GDP增速回落至9.9%，第四季度还应出现更大的回落，按保守的估计，全年能实现9.8%的增速已经是非常不易，与去年11.4%增速相比，至少要回落1.6个百分点。目前中国经济还远未触底，2009年极可能继续下挫，对此很多人进行了预测，有认为会破9.5%，也有人担心会破8%。如果综合各方的观点，取一个折中的数字，2009年的经济增速可能会在9%左右，因此与2007年相比经济增速将累计回落2.4个百分点；其次是各地区个产业的具体情况。东部地区由于出口遭遇重创，以制造业为代表的工业部门将出现更严重的困境，其下滑幅度应当比经济整体的下降幅度更大，与2007年16.8%的增速相比至少回落3个百分点，降至13.8%；东部的服务业由于受出口的直接冲击没有工业部门那么大，回落速度应比经济总体的回落速度稍小一些，预计在2个百分点左右，降至14.3%；而中西部地区受出口冲击较小，并且一直是政府重点工程投资的重点，预计本轮积极财政政策也会对中西部地区产生较大的影响，因此这两个地区的第二和第三产业下挫幅度应该更小。预计与2007年相比，增速会回落1.5个百分点左右。这样，中部地区第二和第三产业的增速将降至18.3%和13.3%；而西部地区两个产业将降至21.8%和12.8%。

结合各地各产业的就业弹性和增长速度，以2007年各地各产业的就业数据为基础，我们可以测算出2009年各地各产业的新增就业规模，见表4最后一列，可

以看出，东部地区将增加就业494万，第二产业只有265万，其就业拉动能力跌落到与第三产业相近的水平；中部地区将提供新增就业373万，比东部地区仅少出120万，中部将成为就业的一个重要支撑点，尤其是其服务业，将提供223万的就业岗位，比第二产业多出73万；西部地区将提供252万新增就业，其中服务业达到167万，接近于工业部门的两倍。总的来看，2009年新增就业机会大约为1120万，与2007年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所新增的1707万就业岗位相比，将整整减少600万。这很可能会是引发失业风潮的一个突破口。

要进一步估算来年的失业规模，还必须估测出非农产业需安置的新增岗位：第一，上年“结转”的失业人数，如前所述，目前我国失业人口的规模大约为2250万人；第二，城镇新增劳动人口，根据劳动与社会保障部的预测，“十一五”期间我国城镇每年新增劳动力大约为1000万人，我们假设2009年仍会延续这一增长速度；第三，大学毕业生，这几年毕业生进入高峰期，2008年除去考研、考博、出国等情况，实际需就业的毕业生达到600多万人，2009年应不会低于650万人；第四，农村转移劳动力，根据十一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劳动与社会保障部所公布的数据，我国近年来每年有近800万的农村劳动力转向城市部门；最后是在岗人员的退休、死亡等自然减员，这可以相应地消减需安置岗位。从近年来的数据看，大约在300-400万之间，假设经济不景气情况下，政府、企业或各类组织出台政策鼓励员工提前退休，所以取上线400万。这样我们就可以发现，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我国非农产业需新增的就业岗位应该达到4300万。

用4300万需安置的新增就业岗位，减去1120万非农产业实际能提供的新增就业机会，我们就可以发现2008-2009年，我国的失业规模将会接近3200万，这比2007年2250万的基础上再新增近1000万。用失业规模除以届时非农产业的劳动人口就可以发现，失业率也将由目前的7.1%攀升到9.3%左右。这个结果与王梦奎的观点非常接近，他认为我国失业率已达到8%-10%。当然上述失业率的计算，既包括城镇劳动力，也包括农村转移劳动力，如果刨去农民工的失业，仅就城镇劳动力来计算失业率的话，那么城镇失业率应达到8%左右。

五、失业原因及特征分析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认为造成未来大规模失业的原因及渠道是：

1、失业风险主要源自产值增速的下降而不是要素结构的变化

目前我国非农产业的就业产值弹性并不低，工业部门平均能达到0.15左右，服务业部门能达到0.20左右。较高的就业弹性是一面双刃剑，在经济快速增长的情况下，通常能够快速拉动就业，但在经济下滑的情况下，也会对就业造成重挫，产值速度的放缓将吞噬大量就业机会。前文的分析就表明，在未来一年内，

经济下滑将迫使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新增就业机会比上年减少600万。当然，造成失业危机的另一个可能原因就是经济增长方式的劳动节约化，但分析表明，目前就业替代还没有在我国大规模地展开，工资上涨对就业的主要影响还是表现在对产业发展的制约上，对要素投入结构影响还不十分明显。正是从这个角度讲，遏制经济过度下滑的势头，是我国当前应对失业危机的政策重点。

2、东部地区就业拉动能力锐减是引发失业风潮的导火索

由于东部地区经济的外向度高，在本轮世界经济波动中受到的冲击程度要远大于中西部地区，这也使得东部地区的就业吸纳能力锐减。分析表明，2009年东部地区提供的新增就业机会只有494万，比中部地区仅多出120万，这与以前东部地区大规模吸纳中西部劳动力的情形相比，前者在就业拉动方面的优势正在迅速缩小。目前东部地区正在加速释放劳动力，可以预见的是，大量来自中西部地区的劳动力尤其是农民工，将踏上返乡的路途。有报道称今年广东省许多外来务工人员由于无活可做已提前返乡过春节，留下来的也随时可能会失业。

3、制造业和建筑业的困境是导致大规模失业的两个主要源泉

由于受到世界经济不景气的影响，以制造业为代表的出口导向型的工业部门受到重挫，而这些部门具备两个特点：一是聚集了大量的底层就业人口；二是就业弹性很高。所以在经济下滑的背景下，制造业部门率先释放大量劳动力，据称仅刚倒闭的合俊集团一家就丧失了近8000个就业岗位。建筑业是第二产业中另一个底层劳动力高度积聚的部门，目前建筑行业困境重重，大量的从业人员失业。在整个第二产业中，制造业和建筑业的就业总量占据了绝大多数，所以这两个行业的萎靡在总体上导致第二产业的就业拉动能力急剧下降。前述分析表明，2009年第二产业的新增就业规模只有500万左右，比2007年的1400万的水平低出整整900万。与此相反，第三产业的就业形势并不象第二产业那么糟糕。

4、劳动力的刚性强劲供给也是加剧失业风潮的重要原因

我国劳动力供给具有极强的刚性，在经济下滑导致就业机会锐减的情况下，劳动供给仍呈现出刚性的强劲上涨，从而使就业缺口迅速扩大。除了劳动人口的自然增长以及大学毕业生外，目前最大的一块来源就是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压力，从1984年我国放开农民进城务工的口子后，农村劳动力持续流向城市部门，但真正出现大规模、持续性转移压力的是在近些年，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农业生产方式正发生着飞跃性变革，农业生产的机械化和生产组织方式的社会化，正在把大量的隐蔽性失业劳动力转化为显性剩余劳动力，所以即便是农村重大制度创新和务农收入提高也难以从根本上缓解劳动力转移的动力和压力。目前光农村转移劳动力一年就要吃掉800万就业岗位，非农就业机会可谓僧多粥少。

改革以来我国出现过几次失业高峰，最近一次出现在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

通过梳理和对比，我们认为本轮失业将呈现出如下几个方面的特征：

1、结构性失业让位于周期性失业

自2004年“民工荒”爆发以来，我国失业主要表现为结构性失业，即由于劳动者技能不符合用人单位的要求所造成的，失业主要是低技能工人的失业，而高技能工人则出现短缺的现象。这种结构性失业，只需要加强员工的技能培训就可以消除。但目前我国的失业形态正在发生转化，未来的失业将主要以周期性失业的形式表现出来，不仅低技能工人，高技能工人同样也面临失业威胁。失业对于一个行业内的所有工人来讲，构成了一种系统性风险。失业形态的转变要求治理失业的政策重点也要从消除结构性矛盾转向消缓经济下滑的速度上来。

2、失业将表现出明显的群集性特点

未来的失业将在三个方面表现出群集性：首先是行业的群集，出口导向型的制造业将构成第一类失业群集的行业，而房地产、建筑业将构成另一大失业群集的行业；其次是地区群集，对于东部地区来说，虽然就业拉动能力下降，但由于本地的剩余劳动力并不多，释放的主要是外来劳动力，所以东部地区自身不会构成一个失业群集的地区，恰恰相反，对于中部地区来说，由于仍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再加上从东部返流的劳动力，其就业压力将空前加大，因此作为传统的劳动力输出地的中部地区可能会成为本轮失业的主要群集区；最后是个体失业的群集性，弱势劳动群体，尤其是年龄大、文化低、技能差的劳动者很可能成为本轮失业的群集性个体，前几年实施的就业帮扶政策的成果可能会被侵蚀。

3、城镇的公开性失业倒逼农村的隐蔽性失业

与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的失业风潮相比，本轮失业风潮并非由体制性因素所导致的，而是由市场力量引起，受冲击的也主要是受市场力量支配的民营企业，所以失业不会以传统体制下的隐蔽性失业形式表现出来，而是迅速地表现为公开性失业，很多失去工作的农民工将被迫返乡，农业劳动力被迫回升，农业生产的隐蔽性失业可能会重新抬头，因此城镇公开失业的减少可能会以农业隐蔽性失业的增加为代价，农业生产和农村发展由此会受到影响。

4、非正规部门的就业也会受到严重冲击

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那次失业危机中，以体制内部门为代表的正规就业受到严重的冲击，而在体制外部分，非正规就业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但在本轮的经济下调过程中，由于经济下挫幅度深、波及面广，非正规就业也可能会受到严重冲击。这对于习惯于依赖非正规就业来解决就业难题的我国来说，是非常值得警惕的，一旦非正规就业锐减，就可能会引发种种社会问题。

5、失业的持续时间长、民生危害大

美国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冲击才刚刚开始，世界主要经济体都可能面临更

严峻的考验，并进入一个较长的调整通道，我国也不例外，目前我国经济还远未见底，经济下调可能会持续较长时间，以制造业为代表的劳动密集型部门的长期低迷将对就业构成长期的压力。另外，由于本轮失业冲击的主要是弱势劳动群体，其民生后果更严重，如何应对失业风潮下的社会保障问题，是必须考虑的。

六、政策建议

针对我国可能出现的失业高峰，本文提出如下几点政策建议：

1、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必须以促进就业为导向

在当前形势下，我国政府应意识到就业问题的严重性，并在积极的财政政策实施过程中贯彻促进就业的意图。1998年我国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也连续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但并没有带来明显的就业后果，没有为当时就业难题的化解做出应有的贡献。今天积极的财政政策再次提上日程，而在本轮的财政政策实施过程中，应当避免上次出现的问题，优先选择就业弹性大的项目。

2、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促进中小企业和服务业的发展

中小企业吸纳了我国就业的相当份额，它们的兴衰对就业会产生很大影响。但是近年来民营中小企业的生存状况堪忧，税负过重、资金缺乏是普遍的原因，当前政府应通过各种税收减免和金融扶持政策来提升中小企业的生存能力。另一方面，本轮经济下滑冲击最大的是工业就业，服务业就业受影响的程度相对较小，因此政府可以通过各种政策引导有限的资源向服务业集中，促进服务业的发展，通过服务业的就业拉动来尽量弥补工业下挫所引发的就业损失。

3、加大对失业转岗人员的培训，提升其再就业能力

失业人员能否顺利再就业，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其知识、技能、素质能否成功转型，培训就是提高这种再就业能力的一个重要途径。政府可以动用财政资源提供这样的培训服务，弥补市场在这一方面的不足，政府甚至可以把举办再就业培训和服务，作为积极的财政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来进行设计。

4、做好农村转移劳动力的引导，减少盲目流动

在经济下滑和失业加剧的情况下，城镇就业机会不足以支撑大规模的转移劳动力的就业需求，农村劳动力的盲目流动，不仅在经济上是低效率的，更会加剧城市部门的失业程度，甚至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因此对农村劳动力转移不能再一味地鼓励，而应当采取有效引导的政策，减少不必要的盲目流动。

5、实施消极的就业政策，做好失业人员的生活保障

在失业不可避免的情况下，失业人员的生活保障尤为重要，目前我国对失业人员的生活保障标准还比较低，特别是失业保险金和最低生活保障这两道保险不

足以让失业人员达到应有的生活标准，各地政府应做好相应的调整工作。

6、适时调整劳动管制政策，避免对就业的过度损害

从2004年以来我国逐步加强了对劳动市场的管制，从新的《最低工资规定》到《劳动合同法》，弱势劳动群体的劳动利益得到了保护，企业负担也不断加重，在当前出现就业危机的情况下，对劳动者来讲，最重要的是就业机会。实际上，随着这几年劳动管制的推进，它对就业的损害已经开始显现出来。就以最低工资标准为例，有些地方已经接近千元大关，很多企业是难以承受的。在这种情况下，各地政府应根据形势的变化适时调整劳动管制政策，放松某些管制措施的力度，尤其是最低工资管制的力度，适当放缓最低工资标准的调整幅度和频率。

参考文献：

- [1] 蔡昉、都阳、高文书：“就业弹性、自然失业和宏观经济政策——为什么经济增长没有带来显性就业？”，《经济研究》，2004年第9期。
- [2] 陈安平、李勋来：“就业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经验研究”，《经济科学》，2004年第1期。
- [3] 程连升：“中国经济‘高增长、低就业’的变化趋势和原因分析”，《教学与研究》，2007年第3期。
- [4] 丁守海：“城市部门对农村劳动力就业效应的区域比较”，《经济科学》，2006年第2期。
- [5] 龚玉泉、袁志刚：“中国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的非异质性及其形成机理”，《经济学动态》，2002年第10期。
- [6] 侯风云：“中国农村劳动力剩余规模估计及外流规模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中国农村经济》，2004年第3期。
- [7] 李红松：“我国经济增长与就业弹性问题研究”，《财经研究》，2003年第4期。
- [8] 蒲艳萍：“中国经济增长与失业关系的实证研究——有效就业分析与协整检验”，《南京师大学报》，2006年第1期。
- [9] 齐建国：“中国经济的最大威胁是就业弹性急剧下降”，《世界经济》，2000年第3期。
- [10] 鄢雪芬：“经济发展与劳动就业增长的实证研究”，《统计研究》，2007年第11期。
- [11] 张本波：“我国就业弹性系数变动趋势及影响因素分析”，《经济学动态》，2005年第8期。
- [12] 张车伟、蔡昉：“就业弹性的变化趋势研究”，《中国工业经济》，2002年第5期。